

她不是纳粹，
却一日三次，
日复一日地，
拯救希特勒的性命。

Rosella Postorino

[意] 罗塞拉·波斯托里诺 著
雪川 译



希特勒 的 试毒者

2018年意大利
坎皮耶罗文学奖
获奖作品

天才般横空出世
炸弹式引爆全球

版权售出美、英、法等22国

力压斯蒂芬·金、肯·福莱特作品
雄踞法国畅销榜18周

爱、友谊、悔恨、秘密，遮蔽在死亡的阴影下
每一口给你生命的食物，也可能杀死你。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特勒的试毒者 / (意) 罗塞拉·波斯托里诺著；雪川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6

ISBN 978-7-5596-3026-1

I. ①希... II. ①罗... ②雪...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8034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9-1679号

© 2018 Rosella Postorino

希特勒的试毒者

作者：（意）罗塞拉·波斯托里诺 译者：雪川

产品经理：贾楠 版权支持：张婧

责任编辑：郑晓斌 徐樟 特约编辑：金宛霖 丛龙艳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千字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25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3026-1

定价：6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

质量投诉电话：010-57933435/64258472-800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二部分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三部分](#)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他只有彻底忘掉自己是人，
靠这个，他才能活。

——贝尔托·布莱希特《三分钱歌剧》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我们一次进去一个。在走廊里站着等了几小时之后，我们都需要坐下来歇一歇。房间很大，四周是白色的墙壁。房间中央的长木桌上已经摆放好了餐具。看守们示意我们坐下。

我正襟危坐，双手交叉着放在腹部。我的面前摆着一只白色的瓷餐盘。我饿了。

其他的女人也都无声地坐下了。我们一共十个人。有几个妇人文雅地坐得笔直，头发束在发髻里。还有的四处张望着。我对面坐着的女孩脸蛋软软的，美中不足的是有一只酒糟鼻。她用牙齿啃下手指上的死皮，用门牙不停地咬着。她也很饿。

上午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很饿了，这和乡下的空气或长途跋涉无关。这是因为我们胃上的那个空洞让人感到害怕。这是长年累月堆积起来的饥饿和害怕。当食物的香气钻进鼻子里时，我的心跳突突地直蹿到太阳穴，口水一下子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我瞥了一眼那个酒糟鼻子女孩。看来她和我一样。

四季豆里拌着黄油，我上一次吃到黄油还是在我的婚礼上。烤过的果椒的香味不停地挠动着我的鼻子，我的盘子已经装不下了，但我还是没有叫停盛菜的人。而我对面女孩的餐盘里是米饭和青豆。

“开吃吧。”屋子角落里的一个声音说道，那语气听起来与其说是命令，倒不如说是邀请。他们从我们的眼神中看到了渴望。我们松了口

气，呼吸也加快了。但我们一开始还是很犹豫。还没有人说祝我们有个好胃口，也许我本可以站起来说一句“感恩”，感恩今早的母鸡们如此慷慨，虽然我今天吃一个鸡蛋就够了。

我又数了一下人数。我们一共十个人，这不是最后的晚餐。

“快吃！”角落里又传来了声音。我已经吸了一根四季豆到嘴里，我感到血液在我身体的每个角落流动，从发根直到脚趾，我的心跳逐渐放缓。怎么会有食堂为我准备饭菜呢——那甜甜的果椒——这样给我准备的一个食堂，一张连桌布也没有的长木桌，亚琛⁽¹⁾产的瓷盘和十个女人，如果我们戴着面纱，那看起来就会像十个在修道院饭厅发誓噤言的修女。

一开始我们只是抿几口，好像我们根本没有收到要全部咽下去的命令一样，好像我们可以拒绝吃一样。这些食物，这顿饭本不该由我们吃下去，只是碰巧罢了，我们碰巧有资格来到他们的餐厅。食物顺着我的食道滑落，最后着陆在我胃里的那个空洞上，但是空洞被填得越满，欲望就越大，我们渐渐地攥紧了手中的刀叉。苹果派的美妙滋味让我几乎热泪盈眶，我每一口都是越吃越多，简直是狼吞虎咽，最后不得不在敌人的注视下把头朝后仰，好把东西咽下去喘口气。

我妈妈曾经说过，吃饭是在和死亡做斗争。她告诉我这句箴言的时候，希特勒还没有上台，我还在柏林布劳恩斯德盖斯10号上小学，那是个没有希特勒的时代。她在我的围裙上别了个别针，一边把书包递给我，一边警告我吃午饭时要注意，千万不要噎着。在家时我有一个坏习惯，吃饭时叽叽喳喳讲个不停，就算嘴里塞满了吃的，我也照说不误。妈妈一数落我这个毛病，我就被她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和她的死亡威胁式教育方式逗得哈哈大笑，一时间真的喘不过气来了。好像每一个为了生存所做的举动都可能让我们走向死亡：活着就很危险；整个世界更是危机四伏。

我们吃完后，两个党卫军朝我们走过来，我左边的那个女人站了起来。

“坐下！在你的位置上坐好！”

他们还没过去按她坐下，那个女人就自觉地迅速坐下了。一绺头发从她绑着的麻花辫上的发夹里松散下来，轻轻地晃动着。

“谁许你们站起来的？新的命令下来前都给我好好地在桌边待着。不许讲话。如果食物有毒的话，毒素很快就会进入你们的血液。”一名党卫军朝我们一个一个地看过去，应该是为了观察我们的反应。我们大气也不敢出。接着他转向之前站起来的那个女人：她身穿一件巴伐利亚紧身裙，也许她备受敬重⁽²⁾。“别担心，只需要等一个小时就好，”他对她说道，“一小时之后你们就都自由了。”

“或者死了。”他的一个同事补充道。

我感到心头一紧。那个有酒糟鼻的女孩双手捂住脸压抑着抽泣声。“别哭了。”她边上一个棕色头发的女人说道。但是好几个女人都哭了起来，也许这是一种消化反应，就像吃饱了的鳄鱼会流泪一样。

我压低声音问道：“我可以问一下您叫什么名字吗？”酒糟鼻女孩没有反应过来我在问她。我伸出手，碰了碰她的手腕，她的手弹开了，闷闷地看着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又问了她一遍。女孩转过头看了看党卫军站着的角落，一时间不知道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她能不能讲话。看守们都心不在焉，快中午了，他们也都有气无力的。也许是估摸着不会被发现，她终于轻轻地告诉我：“莱妮，莱妮·温特？”她说得像个疑问句，但这就是她的名字。“莱妮，我叫罗莎。”我告诉她，“放心吧，过一会儿我们就能回家了。”

莱妮应该还只是个小姑娘，从她胖乎乎的手指上可以看出来；她应该没有在于草房被人碰过，就算在秋收后的农闲时也没有。

1938年，在我的弟弟弗朗茨离开之后，格雷戈尔把我带去格罗斯-帕特斯奇见他的父母。“你会喜欢他们的。”他对我说道。他很是为能征服自己从柏林来的秘书而骄傲，我们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订了婚。

坐在摩托车副座上的那段旅程很棒，就像歌曲中唱的那样：“我们骑马向东行。”各地的喇叭都播放着这首歌，而且不仅仅在4月20号⁽³⁾放这首歌。每天都是希特勒的生日。

那是我第一次坐渡轮，也是我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出远门。赫塔把我安排在她儿子的房间里，然后把格雷戈尔赶去阁楼睡觉。但是当他的父母都睡熟之后，格雷戈尔打开了我的房门，钻进了我的被窝里。“不，”我小声地说，“别在这儿。”“那去干草房。”我睡眼惺忪。“不行，被你妈妈发现了怎么办？”

我们还从未做过爱。我之前也从未和任何人做过爱。

格雷戈尔的双手缓缓地抚过我的嘴唇，他先是沿着我嘴唇边缘滑了一圈，然后手指慢慢用力，摸到了我的牙齿，他的两根手指伸进了我的嘴巴。我的舌头感觉它们干干的。只要我想，我就可以收紧牙关咬伤他。格雷戈尔显然根本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他总是信任我。

那个晚上我没有再坚持，我上了阁楼，自己打开了门。格雷戈尔睡着了。我将我的双唇贴上他的，交换着我们的气息，终于将他弄醒了。“你想知道我梦里的味道吗？”他朝我微笑道。我把一根手指塞进他的嘴里，然后加到了三根，我感到他的嘴巴被慢慢撑大，我的手指被他的口水浸湿了。这就是爱：不会咬伤人的嘴巴，或者是背叛来临时的撕咬，就像反抗主人的狗一样。

在回家的旅途中，有一次他用手抓住了我的后颈，我那时候戴着一串红色石头制成的项链。当时不是在他父母家的干草房里，而是在一间没有舷窗的小屋里。

“我得出去。”莱妮喃喃道。只有我听见了。

莱妮身边棕色头发的女人颧骨很突出，头发光亮，眼神没有一丝闪烁。

“嘘。”我安慰地搓了搓莱妮的手腕，这次莱妮没有躲开，“只剩二十分钟我们就能出去了。就快结束了。”

“我必须得出去。”她坚持着。

棕色头发的女人这次瞪了莱妮一眼，怒道：“你还真不知道保持安静啊？”

“你干什么呀？”我几乎失声叫道。

党卫军扭头朝我们这儿看：“发生什么了？”

所有女人都朝我们这边看过来。

“求您了。”莱妮说着。

一个党卫军走过来，拉起莱妮的一只胳膊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我听不到他说话的内容，但是他揉搓着莱妮的脸，把她的脸都弄变形了。

“你不舒服吗？”另一个看守问道。

那个穿着巴伐利亚紧身裙的妇人又一次从椅子上跳起来：“是毒药！”

其他人也纷纷起身，莱妮犯了一阵恶心，那个在她面前的党卫军急忙避开，莱妮吐了一地。

看守们连忙跑出去找厨师质询，元首说得一点没错，英国人想要毒死他。女人们互相抱着慰藉，有几个对着墙抽泣，棕色头发的女人双手叉腰在房间里前后踱步，鼻子里不停地发出一种怪声音。我走到莱妮身边，扶起她的额头。

有的女人开始用手托着肚子，不是因为肚子疼，只是饿了太久，一下子吃饱了不适应。

他们把我们留在食堂里几个小时。地板已经用报纸和一块又湿又厚的抹布清理干净了，只有空气中还飘浮着呕吐物的味道。莱妮没有死，她只是不断地颤抖。渐渐地她靠着餐桌睡着了，她的脸枕着胳膊，手还被握着。她还是一个小孩子啊。我感觉到我的胃里也一阵翻江倒海，但是我太累了，累到都没有力气再去感受不安。格雷戈尔已经应征入伍了。

他不是纳粹，我们从来都不是纳粹。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一点也不愿意加入德国少女联盟⁽⁴⁾，我不喜欢在白衬衫高领下飘动着的黑色围领巾。我从来不是一个好德国人。

当我们消化着食物，渐渐对时间没了概念的时候，警报声又响了起来，看守们过来叫醒了莱妮，让我们排队上车回家。我的胃不再翻腾：它刚才很是忙碌了一阵。我的身体吸收了元首的食物，元首的食物在我的血液里循环。希特勒安全了。而我又一次感到了饥饿。

第二章

我被食堂白色的墙壁环绕着，从那一天起我成了希特勒的试毒员。

1943年的秋天，我二十六岁，足足跋涉了七百多公里、花了五十多个小时才从柏林来到东普鲁士。这是格雷戈尔的家乡，但格雷戈尔不在，他去参加战争了。而我为了躲避战争来到了格罗斯-帕特斯奇，如今已经一周了。

我到公婆家的第一天，党卫军就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他们说找罗莎·绍尔。我当时正在后院，没有听见。我自然也没有听见他们的吉普车停在家门口时发出的刺耳噪声，只是看见母鸡们争先恐后地跑回了鸡舍。

“他们找你。”赫塔说。

“谁？”

她转身走了，没有回答我。我喊了一下扎特，但是它没有过来。扎特是一只天性自由的猫，它早晨总是会去田野里溜达。我一边跟着赫塔往屋里走，一边充满疑惑：我刚来这里，又没有人认识我。哦，我的天哪，难道是格雷戈尔回来了吗？“是我丈夫回来了吗？”我问她的时候她已经走进了厨房，我只能望见入口处她遮住了阳光的背影。而约瑟夫也在那儿，一只手扶着桌子，看上去站立不稳，像要摔倒一样。

“希特勒万岁！”两道黑色的身影朝我挥出了右臂。

我一边跨过门槛，一边也挥起了右手。阴影随着他们的贴近而从他们的脸上褪去。厨房里站着两个身着灰绿色军服的男人。其中一个见了我说道：“你是罗莎·绍尔？”

我点点头。

“元首需要你。”

元首从来都没有见过我。但是他需要我。

赫塔用围裙擦干手，党卫军继续在说话，他们看向我，独独盯着我一个，像是要仔细检查我是不是一个身体强健的人。长期的饥饿的确让我有一些虚弱；无数个夜晚响起的警报声也让我缺乏睡眠；我失去了一切，失去了身边所有人；我的眼睛也有所损伤。但是我浑圆的脸庞、茂密而金黄的头发无一不透露着我是一名被战争驯服的年轻的雅利安女性。他们试着相信，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民族的产物，他们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完美的结论。

党卫军向我走来。

“我可以给你们准备点什么吗？”赫塔到了这时候才想起来问这句话，简直是迟钝得有些不可原谅了。乡下人不知道该怎么去招待重要的来宾。约瑟夫终于站直了身子。

“明天早晨八点我们还会再来，我们希望你已经准备好了。”

整个过程中我始终一言不发，但党卫军根本就没有顾及我的意见。

党卫军说了一些恭喜的话，又说他们不喜欢烤橡果咖啡。也许可以用那瓶储藏在地窖里等格雷戈尔回来时再开的红酒招待他们，但他们依旧没有领情：赫塔的反应太慢了，必须得承认这一点。又或许是因为他们从不向饮酒的恶习屈服，他们不断锤炼着自己，直到有一天远离恶习，获得了强大的精神意志。他们振臂高呼“希特勒万岁”——向着我。

他们的吉普车开走之后，我来到了窗边。路面上轮胎碾过的痕迹指引着我即将面临的道路。我转身来到了另一间房间的窗边，在屋里来回踱步。我急切地想要呼吸新鲜的空气，想找到一条可以逃离的路。赫塔和约瑟夫亦步亦趋地跟在我的身后。拜托了，让我一个人好好想一想，让我一个人好好呼吸吧。

是镇长把我的事情告诉党卫军的。一个小镇的镇长永远认识镇上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新来的人，他也不会不知道。

“我们得想个办法。”约瑟夫的手紧紧地攥着胡子，好像生怕手一松，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会从他手上溜走一样。

为希特勒工作，为希特勒卖命，难道不是每一个德国人眼下都在做的事情吗？但是因为吃了被下毒的食物而送命，这算什么？！不是被子弹击中，也不是在爆炸中牺牲，约瑟夫不能接受这一点。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去，上不了一点台面，老鼠才会这么死呢，英雄般的死法从来都不会这么不堪。然而女人从来就不会像英雄那样死去。

“我要离开这里。”

我把脸贴在玻璃上，试着深吸一口气。可是胸口处传来的剧痛让我无法用力呼吸。我换了一扇窗户，这次我的呼吸又被肋骨处传来的疼痛打断了，我失去了呼吸的自由。

“我搬到这儿是为了生活得好一些，没想到我反而要被毒死了。”我笑中带恨，暗暗将矛头直指我的公公婆婆，虽然根本不是他们招来党卫军的。

“你应该藏起来，”约瑟夫说道，“你得逃到一个地方去。”

“到树林里去吧。”赫塔建议道。

“哪里的树林？我在那儿只会又冷又饿。”

“我们可以给你带吃的。”

“很明显，”约瑟夫赞同道，“我们不会抛弃你的。”

“那如果他们到处搜查我呢？”

赫塔问她的丈夫：“你觉得他们会到处找她吗？”

“他们不会给她好果子吃的，但应该不会找她吧……”约瑟夫有些语无伦次。

真可笑，我是一个没有军队的逃兵。

“要不，你回柏林吧？”他建议。

“对啊，你可以回到柏林去啊，”赫塔跟着附和，“他们肯定不会追到柏林去找你的。”

“可是我在柏林已经没有家了，你记得吗？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也不会到这里来。”

赫塔脸上一僵。我一下子把我们之间一直蒙着的遮羞布扯开了：虽然我们是婆媳，但是我们都不了解对方。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都过去了。”她急促地打断了我。

刚才我对她的不敬却在冥冥之中打开了我们互相信任的门，我第一次有了和她亲近的想法，我甚至想上去抱抱她，她会抱住我，她在担心我。

“那你们呢？”我问，“如果党卫军来了我不在，他们找你们麻烦怎么办？”

“我们会有办法的。”赫塔说着，走开了。

“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吗？”约瑟夫攥着胡子的手已经松开了。那里根本就没有解决的办法。

我宁愿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也不愿意死在自己的家乡，因为在我的家乡已经没有亲人了。

成为试毒员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公鸡一打鸣，恼人的青蛙们就像突然间都困得瘫睡过去似的，一下子就停止了它们持续一整夜的呱呱声。我一夜无眠，充满了孤独。窗户玻璃上反射出一双有着黑眼圈的眼睛，我认出了我自己。我的黑眼圈与失眠或战事无关，它从小就跟着我了。妈妈曾经对爸爸说：“你快别看书了，看看你女儿的眼睛是怎么了？”爸爸问医生：“她是不是缺铁？”而我的弟弟会用他的额头贴着我的额头，因为皮肤接触时那种滑滑的像丝一样的触感总是能让他很快入睡。在窗户上的倒影里我看见了小时候的眼睛，我知道这是一种预兆。

我出门去找扎特，它蜷成一团，像母鸡看守员一样睡在鸡舍的栅栏

边上。再怎么说明，让姑娘们单独待着是不谨慎的。扎特作为一只保有良好绅士习惯的公猫，深谙这个道理。格雷戈尔却离开了我，他想要做一个好德国人，而不是一个好丈夫。[此书分享V信wsyy 5437]

格雷戈尔把我们第一次约会地点定在主教堂边上的咖啡馆，他迟到了。我们坐在咖啡馆户外的餐桌旁，尽管那天阳光很好，风还是吹得人有点冷。我当时完全沉浸于破译天空中小鸟的歌声之中，它们的歌声好像乐曲，飞翔的路线又像精心为我编排好的舞蹈。就在这时，他匆匆赶到了，看上去就像我从少女时期就憧憬着的真爱一样。有一只离群的小鸟既孤单又英勇，一个猛子俯冲下来，几乎要扎进施普雷河^⑤，它用直直地伸展着的翅膀溅起水花，又迅速地朝天上飞去了：那是它即兴的表演、无意识的离群，像醉酒后不由自主的欢愉行为。我感到我的小腿肚为这种欢愉传来啾啾的喜悦声。我面前这位年轻的工程师正和我一起坐在咖啡馆约会，我满心欢喜。幸福才刚刚开始。

我点了一块苹果蛋糕，但一口也没吃。格雷戈尔察觉到了：“你不喜欢吗？”我笑了笑：“我也不知道。”我把盘子向他那边推了推好让他吃。他咬下一口蛋糕，那快速又娴熟的咀嚼的样子让我也想吃了。于是最后我们吃着同一个盘子里的东西，漫无边际地闲聊着，却始终没有看对方的眼睛，好像这种亲密已经过了火。突然有一瞬间，我们的叉子不经意地交叉在了一起，我们都顿住了。我们双双抬起头，绵长而持久地对视着。鸟儿仍在天空中不知疲倦地盘旋，偶尔有一些累了的，或是歇在树枝上，或是栖在栏杆旁，或是停在路灯边。谁知道呢？也许它们中还有的会噘着尖嘴，埋到水里再也不想飞上来了呢？然后，格雷戈尔主动拿起他的叉子拦住了我的叉子，就好像他触碰到我的身体一样。

赫塔起床拿鸡蛋的时间比平常晚，也许昨天她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所以今天早晨实在困得起不来。她看见我一动不动地坐在一把生锈的椅子上，而扎特趴在我的脚上。她也在我身边坐下来，完全忘记了还要做早餐的事。

大门吱嘎作响。“他们来了？”赫塔问道。

约瑟夫靠在门框上，摇了摇头。他用手指了指打谷场：“我去拿鸡蛋。”扎特摇摇晃晃地跟着他走了。我的双脚因为它的离开感到一凉。

晨光是如此耀眼，就像一阵巨浪打来，撕开了早晨苍白而毫无血色的天空。母鸡们纷纷拍打翅膀，小鸟们唱着歌，蜜蜂们围着人们头上的

太阳光柱嗡嗡鸣叫，但汽车尖锐的刹车声掩盖了它们的声响。

“快起来，罗莎·绍尔！”我们听见了叫喊声。

我和赫塔都站了起来，约瑟夫拿着鸡蛋走了回来。他没有注意到，有一只鸡蛋因为他抓得太紧已经破了。发亮的橙黄色液体从他手指间滴落。我全神贯注地盯着液体，看着它从约瑟夫的手里掉到地上，不发出一点声音。

“快点，罗莎·绍尔！”党卫军步步紧逼。

赫塔贴在我的背上，我心下一阵触动。

我愿意在这里等着格雷戈尔回来。我愿意去相信战争会结束。我愿意去吃东西。

一上巴士，我就迅速地张望了一眼，便坐在最前面空着的位置上，和其他的女人保持一定距离。车上已经坐了四个女人，其中两个坐得很近，另外两个互不理睬。我记不得她们的名字，我只记住了莱妮，当时她还没有上车。

没人回应我上车时打的招呼，于是我透过已经被雨水打得满是污迹的车窗玻璃看向赫塔和约瑟夫。他们站在家门口，虽然赫塔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但她还是朝我挥了挥手，而那只破了的鸡蛋还拿在约瑟夫的手中。我又看了一眼屋子——长满苔藓的瓦片看起来黑黑的，墙面上的灰泥泛着粉色，缬草花在光秃秃的土地上一簇一簇开得正旺。直到一个急转弯之后，他们都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以后的每个早晨，我都要这么看着他们，就像再也见不到他们一样，免得留有遗憾。

拉斯腾堡^⑥的军事区离格罗斯-帕特斯奇只有三公里，它藏在茂密的森林里，从高处根本发现不了它。约瑟夫说，工人们开始建造它的时候，当地居民对每天进进出出的卡车和货车颇有揣测。苏联人的飞机从来没有找到过它的位置，但是我们都知道，希特勒就在那里，就在不远处睡着。也许夏天的时候他也会在床上辗转反侧，绞尽脑汁地想要杀死那些打搅他好梦的蚊子。也许难忍的瘙痒也会让他在皮肤上挠出许多的红点：无论你多厌恶你皮肤上群岛似的红肿小包，总有一块皮肤你希望它永远都好不了，因为抓痒带来的放松是什么也比不上的。

他们把这里叫作沃尔弗尚采——狼穴。狼是希特勒的代名词。我是被掠走的小红帽，最终死在了狼的肚子里。一大群猎人正在搜寻他。抓住了他，他们就会把我放出来。

第三章

我们到达了克劳森多夫⁽⁷⁾，面前是一座用红色砖墙砌成的学校，现在已经被征用作军营了。我们整齐地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穿过入口，温顺得就像母牛一样。党卫军在走廊里拦住我们，对我们搜身。感觉到他们的手在我们的脸颊、腋下停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但我们除了屏住呼吸什么也做不了。

他们在本子上点名记录我们的出勤情况，我们一一答“到”。我注意到昨天对莱妮很不客气的那个棕色头发女人叫艾尔弗里德·库恩。

他们让我们两人一组进入一间充满酒精味道的房间，而其余没有被叫到的女人只能在门外等着。我把手肘靠在一张课桌上，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用一根止血带绑紧了我的胳膊，食指和中指在上面拍打着。抽血这个举动很明显意味着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一种实验品，如果第一天我们只是被当作一种尝试，那么从这一刻起，我们试毒员的身份已经不可改变了。

当针头扎进我的静脉时，我把头扭向了另一边。艾尔弗里德就在我边上，她专注地盯着注射器不断地抽着她的血，很快针管就被越来越暗的红色填满了。我从来没有办法去看我自己的血，一旦我意识到那深色的液体是从我的身体里流出来的，我就会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所以我只能朝艾尔弗里德那边看，看她那笔直得就像笛卡儿坐标一样的姿态，看她毫无波澜的神情。我直觉地意识到了艾尔弗里德的美貌，虽然我尚未亲眼见识到——但她的美如同一个数学定理，只待被人证实。

在我反应过来之前，她已经一脸严肃地盯着我了。她鼻孔张开，似乎空气不够的样子，我张开嘴吸了吸气。我什么也没说。

“按住这儿。”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边提醒我，边用一根棉签按住我

的皮肤。

我听到艾尔弗里德胳膊上的止血带倏地放开的声音。接着她的椅子在地板上“吱呀”一声，那是她站起来的声音。我也跟着站起来。

到了食堂，我先等着别人坐下去。大部分的人都坐在昨天的位置上，莱妮对面的位置空着，那就是我的位置。

早餐是牛奶和水果。到了中午，他们又给我们端来了午餐。我的面前摆着一盘芦笋馅饼。后来，随着试毒次数的增加，我渐渐知道他们将不同的食物进行各种排列组合，以此来进一步控制食物的安全。

我观察了一下食堂的样子——窗户带着铁栅栏，通往院子的出口一直有守卫看守，墙壁上没有绘画——我们就好像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学习一样。我上学的第一天，妈妈送我去学校，当她要离开的时候，我担心我会在妈妈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危险，这个念头让我满是悲伤。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充满威胁，而是因为母亲在危险发生时无能为力，这让我深受触动。我没有办法接受，当我的生命可能在一点点地流逝时，她却置身事外。不在身边虽然不是有意为之，却也可以视为一种背叛。我曾经在教室的墙面上寻找裂缝和蜘蛛网，让它们成为我的秘密发现。我的视线不断地在看起来很大的教室里逡巡，直到我终于看见墙上一块破裂的踢脚线的痕迹，我的心才平静下来。

但是克劳森多夫的食堂墙壁上的踢脚线都是完整的。格雷戈尔不在，我独自一人。党卫军的靴子随着他们的踱步打着节奏，在为我们可能面临的死亡倒计时。这些芦笋是多么美味啊！难道毒药不是苦的吗？我一口咽下去，感觉心跳因此停止了。

艾尔弗里德吃的也是芦笋，她盯着我看，而我一杯接一杯地喝水，以期能淡化我的痛苦。也许是我的衣服吸引了她。也许赫塔说得对，我的棋盘格花纹的衣服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我又不是要去办公室，我已经不在柏林工作了。“把你原来城市的那些作风都改了吧，”我的婆婆这么跟我说过，“不然她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的。”然而艾尔弗里德并不是在用一种我穿错了衣服的眼光看我，又或许就是？但我穿的是我觉得最舒服、最日常的衣服——制服，格雷戈尔这么喊它们。尽管它不会给我带来好运和金钱，我还是会毫无疑问地穿上它，它是我的庇护所；我能用它抵挡住艾尔弗里德毫不掩饰的审视目光。她看我的目光是如此热切，在我衣服的棋盘格子上来回移动，像是能把衣服的车线都磨损了，

像是要把我的高跟鞋都盯得散了架，像是要把我两鬓的碎发压下去一样。我一杯杯地灌着水，感到膀胱要胀开了。

我不知道在午餐结束前我们是否可以离开餐桌。但是我的膀胱实在胀得难受，就像那时每当夜晚的警报声响起，我和妈妈还有公寓里的很多人都躲在不登格斯的地窖里时感受到的那样。但是食堂的角落里并没有木桶，我实在忍得受不了了，起身要求去洗手间。党卫军同意了，他们中的一个高个子大脚看守跟着我，在走廊里时，我听见了艾尔弗里德的声音：“我也要去洗手间。”

洗手间的瓷砖已经有些磨损了，带着黑色的细缝。里面有两个洗手池和四个带门的便池。进去后，我就进了其中的一扇门。可是我没有听见其他门关上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水流声。艾尔弗里德像是消失了。难道她躲在一旁偷听吗？只有我的小便在一片寂静中发出流动的声音，这让我羞愤难当。当我打开门准备出来时，她用脚尖抵住了门，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把我按在墙边。瓷砖闻起来有消毒剂的味道，而她轻轻地、几近温柔地靠近我的脸。

“你想要干吗？”她问我。

“我？”

“为什么抽血的时候你一直盯着我看？”

我试着挣脱她的束缚，但她毫不费力地阻止了我。

“我劝你还是管好你自己的事。毕竟在这种地方每个人最好还是好好管住自己。”

“我盯着你看只是因为我受不了看自己的血。”

“那其他人的血你反而受得了了？”

一声金属碰到木头的声音让我们都吓了一跳：艾尔弗里德往后退了一步。

“你们在做什么？”门外的看守说着走了进来。我感到背上的瓷砖又湿又冷，又或许是我的汗水在作祟。“聊天吗？”他穿着巨大的靴子，用它来碾压蛇头实在是太适合不过了。

“对，可能是因为刚刚抽过血，所以我有些头晕。”我嘟囔道，用手抚摸着臂弯静脉上的那个红点，“她刚刚帮了我，我现在觉得好多了。”

看守警告我们说，如果下次他再抓到我们举止亲密的话，会给我们一个教训的。不，不是教训，他会好好利用这一点的，然后他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笑了起来。

我们回到食堂，一路上每一步高个子都紧盯着我们。

他说错了，我和艾尔弗里德并不是举止亲密，刚才在我们之间弥漫的，是恐惧。我们探测着和身边人的距离，就像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对这世上的一切心怀恐惧一样。

晚上我回到家，上厕所时闻到了尿液中飘出的芦笋的气味，我想到，也许艾尔弗里德也正坐在马桶上，和我闻到了同样的气味。甚至，希特勒在狼穴那坚不可摧的掩体中，在这个晚上，他的尿闻起来和我的一样。

第四章

我出生于1917年12月27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十一个月。我是一份圣诞节后的礼物，妈妈说圣诞老人一定是忘了我，我被毛毯裹着，所以他没看见，谁知他在雪橇上突然听见了我的尖叫声。于是他只能不情不愿地又去了柏林，他的假期刚刚开始，要额外再送一趟礼物对他来说实在算不上一件高兴的事。“还好他最后还是发现你了，”爸爸说，“你是我们那一年唯一的礼物。”

我爸爸是一名铁道工人，妈妈是一名裁缝。我家里客厅的地板上永远都散落着各种颜色的线轴和线头。妈妈总是习惯舔一舔线头，这样线更容易穿过针孔。而我有样学样地舔着线头，把它完全吸到嘴巴里，用舌头抵着上腭，搓弄它，感受它的存在，直到它变成湿湿的一团。我总是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幻想，如果我不当心把它吞进了肚子，它就会进到我的身体里，我会死掉的。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就会不断地猜测我那近在眼前的死亡是否会有什么预兆。但因为毕竟没有死掉，于是我又慢慢地把这个可怕的念头忘了。我很能藏住秘密。每到晚上我又想了起来，确定我的死期到了。这种对死亡的幻想游戏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我从来没和任何人提起。

晚上的时候，爸爸总是习惯听广播，妈妈打扫完地上的线头后会躺在床上打开《德意志汇报》，一脸期待地阅读她喜爱的小说的最新章节。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被蒸汽模糊了的朝向不登格斯的玻璃窗，提前背诵乘法口诀，上学路上穿着嫌大、后来又嫌小的鞋子，被我斩首的蚂蚁，还有周日爸爸妈妈在讲道台上讲诵《圣经》，妈妈会念《诗篇》，而爸爸则会念《哥林多前书》。我就坐在长凳子上听他们讲道，有时候我觉得很骄傲，有时候我又会觉得无聊。我的嘴巴里总是藏着一块芬尼⁽⁸⁾，金属咸咸的，有点扎人。我半闭着眼睛，用舌头把硬币推到喉咙最深处，越往后推越不安，直到发现它快滚下去了，我才赶

紧把它吐出来。我的童年，是枕头底下的书本，是广场上盲目乱飞的苍蝇，是圣诞节的蛋糕⁽⁹⁾，是在蒂尔加滕公园⁽¹⁰⁾里的玩乐。有一次我到弗朗茨的摇篮边，把他的小手塞进我的牙齿间狠狠地咬了一口，弟弟立刻就哭了起来，可是那哭声和新生儿刚睡醒时的哭声一样，没有人知道我对他做了什么。

我的童年做过这样那样的坏事，细细数来都是秘密，我尽量保守这些秘密，不让别人发现，就像我从来没有问过我的父母是从哪儿搞来牛奶的。牛奶太贵了，要花很多马克才能买到，去食品店抢也不现实，有那么多警察盯着呢。甚至几年之后，我也没有问过他们是不是也会为《凡尔赛条约》感到屈辱，他们是不是和所有人一样憎恨美国，他们是不是觉得我父亲参与过的一场战争被判为有罪是有失公正的。我的父亲曾经在一个夜晚和一个法国人一起穿过一个山洞，最后他们在一具尸体边睡着了。

在我的童年时代，整个德国满是伤痕。妈妈在舔线头时嘴唇后缩，看上去像一只乌龟的样子让我发笑。爸爸结束工作后一边吸着朱诺牌的香烟，一边收听广播。弗朗茨在他的摇篮里睡着了，他手臂弯曲，手掌贴着耳朵，他小小的手指都藏在他柔软又肉嘟嘟的手掌中。

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把我的罪行和秘密都一一罗列出来，不带一点悔意。

第五章

“我一点也看不懂。”莱妮呻吟道。晚饭后我们坐在打扫干净的食堂餐桌边，桌上放着打开的书本和看守们发给我们的铅笔。“好多词都太难了。”

“比如说？”

“营养素，嗯，不是营养素，等一下，”莱妮翻了一页书念道，“唾液淀粉酶，还有那个，百事，嗯，不，胃蛋白酶原。”

我们到食堂一周后，厨师来食堂给我们发了一些营养学的文章，要求我们学习。他说，我们的工作是一项严肃的任务，需要有足够的技巧和知识。他说他叫奥托·京特，但我们知道党卫军都叫他“克鲁梅尔”，就是面包屑的意思。党卫军这么喊他大概是因为他又矮又瘦小。每天我们到基地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和助手们准备早餐了。我们一大早就要吃早饭，而希特勒每天会在收到前线消息后的十点左右吃早餐。每天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吃他午饭要吃的东西。吃完后经过一个小时的观察等待，他们就会送我们回家，在下午五点的时候再来家里把我们接去吃晚饭。

早晨的时候，克鲁梅尔给我们发了书，其中一个女人翻了几页就耸了耸肩，冷哼了一声。这个女人的肩又方又宽，和她黑色裙子盖住的细长脚踝完全不成比例。她叫奥古斯丁。莱妮却脸色煞白，好像已经确定，要是问她问题，她一个也答不上来。我却觉得这些书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不是因为我觉得死记硬背这些消化过程有用，也不是因为我觉得把书本上的内容都记住就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而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消遣，我可以重拾我读书时的学习方式，重新找回自己，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告诉自己，不要把真正的自己给弄丢了。

“我真的做不来。”莱妮说，“你觉得他们会问我们什么问题？”

“别担心，”我对她笑笑，“你真以为看守们会坐到讲台上给我们一个一个打分吗？”

莱妮还是没办法换个话题：“也许是医生下次给我们抽血的时候，突然问我们一个特别难的问题。”

“那不还挺有意思的？”

“这有什么意思？”

“我倒是觉得，我们现在学的东西就好像在偷看希特勒的消化器官一样，”我用一种难以理解的喜悦说道，“如果我们做一个类似的计算，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他的括约肌会在什么时候扩张了。”

“咦，怪恶心的！”

这并不恶心，他也是人。阿道夫·希特勒也是一个需要消化的人类。

“教授的课上完了吗？不，我就问问，好等你开完研讨会之后给你鼓鼓掌。”

这是奥古斯丁的声音，就是那个一身黑、方肩膀的女人。看守们没有让我们必须保持安静。因为厨师给了我们书本，这座食堂又恢复了它最初教室的样子，大家尊重厨师的意志，相互讨论，好不热闹。

“我很抱歉，”我低下头，“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的。”

“我们都知道你可是在城里读的书。”

“她在哪里读的书和你有什么关系？”乌拉忍不住插嘴道，“她现在不还是和我们在哪里吃东西吗？好吧，是，饭都很好吃，还加了毒药当佐料呢。”她说完，自己笑了。

乌拉有着纤细的腰、高耸的乳房，党卫军称她是块宝贝。她从杂志上剪下一张张女演员的照片贴在本子上，有时候如数家珍地翻看着：嫁给拳击手马克斯·施梅林的安妮·奥德拉那瓷器般的脸蛋啦；伊尔莎·维内

尔的嘴唇是多么丰润多汁，尤其是当她在电影里对着广播噘起嘴吹出《当你悲伤时唱起一首歌》的副歌时——是啊，一首歌就能驱走你的悲伤与孤独，应该有人去告诉德国士兵的；但乌拉的最爱还是札瑞·朗德(11)在《哈巴涅拉》里海鸥翅膀一样的眉形和两颊边卷曲的刘海儿。

“你这么优雅地来军营多好啊。”她对我说。我今天穿了一条酒红色长裙，法式的领口，袖口蓬松。是妈妈给我缝的。“如果你死了，至少你穿得体面，他们也不需要另外给你准备一件寿衣。”

“你们为什么总是讲这些吓人的事情？”莱妮抗议道。

赫塔说得对，我的穿着让姑娘们无法不注意我。艾尔弗里德第二天就已经迷失在我裙子的棋盘格花纹里，现在她正背靠着墙看书，嘴里叼着的铅笔看起来就像一根灭了烟。她似乎一直在斟酌是站起来走开还是继续坐着不动。

“你喜欢这条裙子吗？”

乌拉犹豫了一下，回答说：“裙子当然好看，就是剪裁太巴黎式了。不过总比戈培尔夫人(12)让我们穿的荣誉裙强多了。”她压低声音，指了指我边上的位置，那是那个第一天午饭之后站起来的女人的位置——格特鲁德没有听见乌拉说的话。

“天哪，听听你们都在说些什么呀！”奥古斯丁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转身离开了。她不知道怎样才能不去理会我们对话中的“不可理喻”，只能假装接近艾尔弗里德。不过艾尔弗里德一直在专心看书，根本不赏脸。

“所以你到底喜不喜欢这条裙子？”我又问了乌拉一遍。

乌拉挣扎再三，终于承认：“喜欢。”

“那好，这条裙子我送你了。”

一个微弱的“砰”的声音让我转过头，艾尔弗里德合上书，双臂交叉在胸前，嘴里仍叼着那根铅笔。

“你准备怎么给她？学圣方济各(13)当众脱了衣服给她？”奥古斯丁听

罢咧嘴笑了，轻捶了一下艾尔弗里德的肩。但是艾尔弗里德没理她。

我对乌拉说：“要是你想要的话，我明天带给你，这样我今天回家有时间把它洗一下。”

大厅里一时议论纷纷，艾尔弗里德终于离开了她靠着的墙，坐到我面前。她故意让书重重地落到桌上，接着，她把手指放在书上，不住地敲着封面。她在观察我。奥古斯丁也有样学样地跟着这么做了。我敢肯定，到了某个时刻她就要给我宣判了。但是艾尔弗里德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她手指的动作也停了。

“柏林来的姑娘要给我们施舍呢。”奥古斯丁还是不肯放过我，“看来不光是生物学得好，教会的精神也掌握得很牢呢。不就是想显摆她比我们强吗？”

“我想要这条裙子。”乌拉说。

“它会是你的。”我回答她。

奥古斯丁的舌头咝咝作响，我发现她每次气急败坏的时候都会这么做。“真他妈的……”

“排队了！”看守们大声喝道。“时间到了！”

女人们纷纷迅速站起来。奥古斯丁虽然明显很享受戏剧冲突，不过离开食堂的欲望还是战胜了一切。今天也能安全地回家，真是太好了。

我朝队伍走去的时候，乌拉用手肘碰了碰我：“谢谢。”她说完跑到前面去了。

艾尔弗里德在我后面说：“这里不是什么柏林的女子学校，这里是军营。”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我惊讶地发现，我脑子一热居然回击了她，“这还是你教过我的呢，对吧？”我知道我只是想找一个借口，我并不想挑衅她。

我希望取悦艾尔弗里德，而不是击败她，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

“总之，”她说道，“那个小女孩说得没错。除非你真的喜欢接受各种中毒症状的教育，否则这些书没有一点意思。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你觉得有趣吗？”

我继续朝前走着，没有回答她。

当天晚上我就洗干净了要送给乌拉的酒红色长裙。送裙子给她并不是因为我慷慨，也不是想博得她的欢心。看着她穿上我的衣服，就像终于放下了柏林的生活，接受了格罗斯-帕特斯奇一样，我终于可以删除柏林在我身上的印记，这是我向柏林递交的辞呈。

三天之后，裙子干了，也熨平整了，我把它裹在报纸里带给了乌拉。我从没有见过她在食堂穿这条裙子。

赫塔量了我的尺寸，把她衣柜里的一些衣服改了改给我穿。她把衣服两侧改窄了，在我的坚持下她又把背后那里改短了一些。我向她解释说这是柏林的时尚。她重复着我的话，把线抿在她的嘴唇中间，就像我妈妈做的那样，只是这乡下家中的地上没有一点线头。

我把那件棋盘格花纹的衣服连同我在柏林做雇员时的所有衣服放进了格雷戈尔的衣柜。我还是坚持穿着原来的鞋子。赫塔警告我：“你穿这些高跟鞋去哪儿都不方便啊。”但是只有穿着这些鞋子，我才能认清楚我自己的脚步。它们现在已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每一个迷雾蒙蒙的清晨，它们都会生气地拦住我的去路。但是，到底为什么要把我和其他的试毒员联系到一起呢？我和她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我要接受这一切？

我在镜子中看见了自己的黑眼圈，我的愤怒在绝望中萎靡不振。我把棋盘格花纹的衣服关进了漆黑一片、深不见底的衣柜。我的黑眼圈一直是对我的一种警告，但是我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眼下我一直害怕的事情终于来临了。我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已经容不下那个在合唱团唱歌的小女孩了，她曾经在下午的时候和女伴出门溜达，辛苦地做着几何作业；也再没有那个忙得焦头烂额的秘书了，现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因为战争而一夜变老的女人，这一切的命运已在她的血液里写就。

1943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的命运就在那夜被操纵。警报像往常一样呻吟起来，一开始声音不大，但紧接着就刺得人耳膜疼。妈妈从床上

跳下来。“快起来，罗莎，”她喊道，“他们开始轰炸了！”

爸爸去世后，我就一直陪在她的身边睡觉。我们身上的体温是如此接近，我们都是成年的女人，我们都曾有过婚姻生活然后又失去了它，在被褥下我总是会想起那些床榻间的缠绵。但是我仍愿意陪在她身边，纵使警笛声不响，她从梦中惊醒时也有我的陪伴。又或许是我自己害怕一个人睡觉。格雷戈尔离开之后我就搬出了我们在奥特美斯维格租住的公寓，搬到了我的父母家。我本来还在练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妻子，然而现在我又不得不回归女儿的身份。

“快跑啊！”她见我正在找衣服，就不由自主地催我，她自己拿了一件大衣披在睡衣外面，穿着拖鞋跑下楼。

警报声和之前的没有什么不同：长时间的哀嚎总是让你以为它会持续一辈子，然而每到第十一秒的时候它就会逐渐减弱直至消失，过不了一会儿它又卷土重来。

一直以来我们只收到过假警报，每次我们都手持火把手忙脚乱地跑下楼，尽管早就对黑暗中的逃亡做了规划，我们还是会在黑暗中跌倒，或者撞到公寓里其他跑向地窖的居民。有的地窖里备有毛毯、瓶装水，孩子们都被安置在里面。有的什么都没有，大家惊慌失色。有时候，我们找到一个狭窄的地方，坐在地上，天花板裸露的灯管照射下的地面寒冷无比，人们互相挤压着，潮湿的空气直钻入骨头。

我们这些住在不登格斯78号的居民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哭泣着、乞求着、呼号着寻求帮助。我们不得不在大家视线可及的一个木桶里方便，要不就必须忍着膀胱的胀痛；一个男孩子咬了一口苹果，另一个立刻把它夺走了，在被一把夺回之前他必须多咬几口才行。我们饥肠辘辘，说不出话来，或者干脆睡觉。黎明终于来临时，我们的脸上都已出现了皱巴巴的纹路。

新的一天就会来临的承诺很快就会被推翻：所谓的柏林郊区这座典雅的建筑即将在新一天的蓝天白云下重见光明，但是我们这些建筑物内的居民并不能够感觉到太多的亮光。我们也绝对不会去相信这个承诺。

那天晚上我搂着我的母亲跑下楼。我自问：防空警报到底是哪个音调？从孩童时期开始，我就在学校的合唱团唱歌，老师赞扬我的音调和音色。但是我从来没有学过音乐，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把音符一个一个拆

开来念。当我被安顿在头戴棕色头巾的莱纳赫夫人身边的时候；当我看着普雷斯女士因为拇指外翻而变形的鞋子、霍勒先生耳后翻起的死皮、施密特夫妇的儿子安东发达的肌肉的时候；当我听到母亲呢喃着“冷吗，披上这件衣服吧”，她身上的味道成了附着在我身上的唯一熟悉的气味的时候，我只想知道，防空警报到底是哪个音调。

飞机的轰鸣声驱赶了每一个想法。妈妈攥紧我的手，她的指甲刺破了我的皮肤。一个三岁的孩子——保利娜——站了起来。她的妈妈安妮·朗汉斯试着把她拉回自己的身边，但是孩子凭着仅仅90厘米的身高，固执地挣扎着，抬起头向后仰，转着圈子用眼睛在空中寻找那噪声的来源，追寻着飞机的轨迹。

随着天花板的颤抖，保利娜摔在了地上。而地面在不断震动，一阵刺耳的哨声淹过了其他所有声音，甚至包括我们的尖叫声和保利娜的哭声。灯倏地灭了，只剩下轰隆声充斥着整个地窖，墙壁开始弯曲，强烈的气流把我们从这一头冲向那一头。在爆炸的轰鸣声中，我们的身体互相碰撞、扭曲，甚至摔落在地上。墙壁已经震碎了，瓦砾纷纷掉落下来。

轰炸结束之后，大家的抽泣声和尖叫声直把我们的耳膜都震得发闷，有些人开始撞地窖的门，但是门被锁上了。女人们尖叫起来，仅有的几个男人一遍遍地踢着门。

我们个个又聋又瞎，爆炸的粉末布满了我们的身体，我们无法辨认出彼此，就算是父母也认不出来了。我只看得到滚滚的浓烟，接着我看见了保利娜。她一侧的太阳穴流血了，我用牙齿撕碎裙子替她止血，然后用布条围住了她整个头部。我在找她的妈妈，也在找我的妈妈。但是我一个人都认不出来。

太阳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被拖出去了。我们的房子没有完全坍塌，但是屋顶上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我们对面的那座建筑物已经完全被掀开了顶，大街上躺着一排伤员和尸体，大家都走投无路了。人们试图呼吸，但是被喉咙里的灰尘烧得火辣辣的，鼻子都塞住了。莱纳赫夫人的头巾不见了，她的头发因为爆炸中的黑色浓烟，都已经结成了一块一块的，好像肿瘤一样。霍勒先生一瘸一拐的。保利娜的血已经止住了。我毫发无损，没受任何伤。但我的妈妈死了。

第六章

“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元首。”格特鲁德说道，她的眼睛眯了起来，十分严肃地对待她的这个声明。她的姐妹扎比内点点头，由于她难以捉摸的轮廓，我并不能判断扎比内到底比格特鲁德年纪大还是小。餐厅里的餐桌已经收拾干净，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就能回家了。在映衬出铅灰色天空的窗户边，站着另外一位试毒员——西奥多拉。

“我也会向他献出生命。”扎比内肯定地说，“对我来说他就像一个哥哥，是我们死去的哥哥戈蒂的化身。”

“我倒是觉得，”西奥多拉开玩笑般说道，“他更像我的丈夫。”

扎比内皱了皱眉头，似乎是因西奥多拉对元首的不尊重而感到不满。奥古斯丁靠到窗上，窗户震了震：“你们把他看得跟你们关系很紧密，他是你们伟大的安慰者，”她说道，“是他把你们的兄弟、父亲还有丈夫派去杀人的。所以，如果他们死了，你们总是可以假装他是你们的兄弟是吧？又或者可以做做嫁给他的白日梦？”奥古斯丁将食指和拇指放到她的嘴边，抹去了嘴角因激动而溅出的白色唾沫，“你们太荒谬了。”

“上帝保佑你刚才说的话没有被别人听见。”格特鲁德话锋一转，“哦，难不成你还想把党卫军招过来？”

“如果有办法的话，”西奥多拉说，“元首肯定会尽量避免战争的。他也是迫于无奈。”

“真是不好意思，你们可不仅仅是荒谬了，你们是完全被洗脑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从那天起格特鲁德的那个小团体就被起了“洗脑

党”的绰号。奥古斯丁这么喊她们纯粹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她的丈夫在前线阵亡了，这就是她永远一身黑色的原因。莱妮告诉了我这件事情。

除了艾尔弗里德以外，女人们都互相认识，她们都是从小在格罗斯-帕特斯奇或者周边地区长大的。莱妮告诉我，她在成为试毒员前从来没有见过艾尔弗里德。所以艾尔弗里德也是一个外乡人。但是从没有人因此招惹过她。奥古斯丁根本就不敢去打扰她，她之所以针对我，并不是因为我从首都来，而是因为她从我的眼中看出了我对适应这个环境的渴望。我或者其他人都从来没有问过艾尔弗里德她是从哪个城市来的，她也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起。她的这种距离感激发了我们对她的敬畏。

我很想知道艾尔弗里德是否也是为了寻找和平而逃到乡下的，是不是和我一样刚一抵达就立刻被选中来当试毒员，他们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而选择了我们。我第一次上巴士的时候，还以为会在车上看到一窝积极的纳粹分子，个个高唱纳粹歌曲，挥舞着纳粹军旗。但我很快就发现，对纳粹的信仰不是他们的选择标准。那几个“洗脑党”除外。他们招募的是不是那些最穷的、最需要的人呢？比如那些有更多的孩子需要去喂饱的人呢？除了莱妮和乌拉这两个年轻姑娘，还有艾尔弗里德以外，其他的女人一直都在讨论着她们的孩子。那三个人没有孩子。我也没有孩子。但是她们手上都没有戴婚戒，而我已经结婚四年了。

我刚到家赫塔就让我帮她一起叠床单。她都没有和我打个招呼，看上去十分地不耐烦，就好像她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要整理这些刚晒好的床单，而我一回家她就一分一秒也等不了了。“拿一下篮子。”通常她会问我当天的工作怎么样，然后会让我去躺下休息一会儿，或者给我准备一些茶。今天她这样的冷漠举动让我感到十分地不自在。

我把篮子拿到了厨房，放在桌上。“用力，”赫塔对我说，“咱们快一点。”

我拉出一张床单的一角，小心翼翼地将它从相互纠缠的床单中解开，并注意不打翻篮子。我有些手忙脚乱，赫塔实在是太着急了，这给我带来了压力。我终于用力把这张床单一抽，一个长方形的白色东西从床单中飞了出来，我以为那是一块手帕。要是它掉到地上，我的婆婆说不定要勃然大怒呢。但是，就在它掉到地上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它不是一块手帕，而是一个信封。我看向赫塔。

“你总算做到了，”她笑了，“我还以为你找不到它呢。”

我也笑了，又惊喜又感激。

“怎么，你还不赶快把它拿起来？”

当我弯腰的时候，她又低声说道：“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到那边去看信，但是你得赶快回来告诉我我儿子怎么样了。”

我亲爱的罗莎：

我终于可以给你回信了，我们行军很久，大多数时间都睡在卡车上。我们已经有一个礼拜没脱下过制服了。我在这个国家的各个村庄和街道穿行越久，就越清楚地发现这里只剩下贫穷。人们没有工作，住的都是简易的茅草棚，根本就没有什么布尔什维克的天堂、劳动者的天堂……现在我们将驻扎一段时间，在信的最底下你会看到我的新地址，你可以给我寄信。谢谢你，给我写了这么多信，很抱歉，我给你回的信太少了。但是我每天结束行军的时候都精疲力竭、头晕目眩。昨天，我整个早上都在战壕里面铲雪，晚上我站了四个小时的岗（我的制服下面穿了两件毛衣），战壕里又堆满了雪。

我把自己埋在稻草袋子里的时候梦见了你，你在我们奥特美斯维格的公寓里睡着，我的意思是，尽管房间有一些不同，但我知道就是那间公寓。奇怪的是，地毯上有一只狗，像是一条牧羊犬，它也睡着了。我没有去考虑为什么咱们家里会有一条狗，我只知道如果它是你养的，我应该注意不要把它弄醒，因为它挺危险的。我只是想躺在你的身边。所以我慢慢地走近，注意不打扰到狗，但它还是醒了，冲我咆哮，而你什么都没有感觉到，还在睡觉。我叫着你的名字，很害怕狗会咬你。突然间，狗大叫一声跳了起来，就在那个时候，我醒了过来。醒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心绪不宁。也许我只是因为和你分离而感到痛苦。但是，现在知道你在格罗斯-帕特斯奇，我安心了，我的父母会照顾好你的。

当我知道你一个人在柏林的时候，你所遭遇的一切都狠狠地折磨着我。我又想起三年前我决定参军的时候我们之间爆发的无数次争吵，加入战争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我告诉你，人不可以太自私，不可以太胆怯。我还记得战争开始之后的那段时间，你那时还太年轻，应该不记得了，但是那种痛苦我一直都记得，我们的人民都太天真了，我们被狠狠地羞辱了。现如今是时候让我们变得强硬了，我必须尽我所能，即

使这意味着要离开你。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想了 [此书分享V信wsyy 5437]。

接下来的段落被删除了，那些纸上画着的线让我看不清楚他写的字，也让我感到不安，我试着辨认他的字，但是一切都是徒劳。“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想了”这句话是格雷戈尔写的。通常他会尽量避免写一些会让他受到制裁的句子，因为害怕邮局会打开信审查内容，他的信总是很短，有的时候甚至会让我觉得冷冰冰的。这次的信应该就是他那个梦导致的，如果他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写出那样的文字，之后他就不得不用暴力把信的内容删除。在有的段落，甚至纸都被划破了。

格雷戈尔曾经告诉过我他从来不做梦，而且因为我重视自己的梦境，觉得梦会影响生活而取笑过我。但是，他因为我而感到的痛苦促使他写了这样一封忧郁的信。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前线的战争会还给我一个不同的男人。我只能问自己：我可以接受吗？我被关进了他从小睡觉做梦的那个房间，但是他儿时的那些梦我从来都不知晓。被那些属于他的东西环绕着并不能让我觉得我和他之间在距离上更近，这一切都比不上我们一起躺在我们租住的那个公寓里，他睡在我旁边，伸出手臂抓着我的手腕。而我躺在床上用另一只手翻着书页，免得我的身体从他的怀抱中离开。有时候他睡着了，手指像弹簧一样，一会儿紧贴在我的手腕上，一会儿又放开，他现在又能抓住谁呢？

有一个晚上，我在睡梦中觉得手有些发麻，想换一个姿势。我轻手轻脚地注意不弄醒他，从他握着的手中挣脱出来。我看见他的手指在空气中抓了抓，然后便握紧了。我对他的爱几乎一下子就涌到了喉咙。

想到我不在家而你却在我父母家时，我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这种感觉十分奇怪。我不是一个会经常感动的人，但是这些天我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当我想着你在房间里四处走动，触摸着那些从我小时候起就在的家具，想着你和我的妈妈做着果酱（感谢她也给我寄了一些果酱过来，请替我给妈妈一个吻吧。再替我问候一下爸爸）。

现在我得走了，明天五点钟我就得起床。管风琴演奏的《喀秋莎》从来没有停歇过，不过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生存下去，罗莎。这是最后一切的结果，不要感到害怕。现在光是听着子弹的呼啸声，我就已经可以猜到它们到底是落在近处还是远处了。我在俄国还学到了一种迷信，他们说，只有你的女人对你忠诚，你这个士兵才永远不会死。意思

是，我可以靠你活着！

为了让你原谅我长时间的沉默，我写了很多，请你不要抱怨我。告诉我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我真的无法想象像你这样的人在乡村生活。当然，最后你肯定会习惯的，你看着吧，你会喜欢那里的。你也跟我说说你现在的这份工作吧，拜托了。你曾经说过你想当面告诉我，因为信里不太方便。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最后的最后，我要给你一个惊喜，圣诞节的时候我会休假，我会在家里待上十天左右，我们可以一起庆祝圣诞节，这将是第一次在我长大的地方庆祝。我实在是迫不及待想吻你。

我拿着信下了床。我又看了一遍，我没有搞错，他真的写了——格雷戈尔要回格罗斯-帕特斯奇了！

我每天都在看你的照片，我把它放在了 my 口袋里，可是没过多久它就变得皱巴巴的了，褶皱已经形成，好像皱纹爬上了你的脸一样。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给我一张照片吧，我手里这张照片中的脸已经显得你比实际要老了。但你知道我想告诉你什么吗？你就算年纪大了也一样漂亮。✓

格雷戈尔

“赫塔！”我挥舞着信走出房间，把它交到我婆婆的手上，“快看这儿。”我指着格雷戈尔写他要休假回来的那一段。我只给赫塔看了这一段，其他的部分都是属于我和我丈夫的小秘密。

“他圣诞节要回来。”我婆婆也几乎不敢相信地喃喃自语。她简直迫不及待地要等约瑟夫回来和他分享这个好消息了。

几分钟前我经历的那些不安已经完全地消散了，幸福充斥着我的所有感官。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我们要再次躺在一起了，我会紧紧地抱住他，这世上再也没有能让我害怕的事了。

第七章

约瑟夫回到家后，我们坐在壁炉旁，畅想着格雷戈尔回来时的场景。

约瑟夫计划着圣诞晚餐杀一只公鸡吃。我很想知道圣诞节那天我是否还要去食堂吃饭。当我们在营房的时候，格雷戈尔会做什么呢？他的父母在这儿，他会留在他们身边吧。我很忌妒赫塔和约瑟夫，他们可以在没有我的情况下跟他一起度过时光。

“说不定他可以去克劳森多夫啊，再怎么讲，他也是一名德军士兵啊。”

“不，”约瑟夫否定道，“党卫军是不会放他进去的。”

我们慢慢聊到了格雷戈尔的童年。我们总是聊着聊着就会回到这个话题。婆婆告诉我，格雷戈尔在十六岁之前一直都是个有点超重的小男孩。

“他的脸总是红红的，就算他不跑步也看起来像喝了酒一样。”

“嗯，没错儿。”约瑟夫补充道，“有一次他还真喝醉了。”

“对！”赫塔喊道，“你提醒我了……罗莎，你听我说，那时候他大概七岁，嗯，反正不会更大了，是个夏天，我们从田里回来看到他就躺在那个箱子上面，就是那儿。”她指了指靠着墙的一个木箱子，“‘我好开心啊，妈妈，’他说，‘你做的果汁好喝极了。’”

“桌子上有一瓶打开的葡萄酒，”约瑟夫解释着，“他几乎喝了一半，我问他：‘我的老天爷，你怎么喝这个呀？’他说：‘因为我太渴

啦。”约瑟夫笑起来。

赫塔也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看见她用因关节炎而变形的手擦拭着眼泪。我想象着它们在清晨抚摸着格雷戈尔以唤醒他的场景，我想到它们在他吃早饭的时候滑过他额头上的头发的场景；还有在所有那些他疲惫地从沼泽地回来的夜晚，它们擦拭他身上一道道的污泥，而弹弓从他短裤的口袋里掉出来的场景。我想到，赫塔每一次打了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因为震惊而几欲砍掉自己的手，震惊是因为一旦打了人就觉得自己变得不像自己了。

“然后他长得太快了。”约瑟夫说，“他蹿得特别高，从早到晚都在长个儿，我看他也没把脚泡在水里呀。”

我把格雷戈尔想象成一棵长得很高的杨树，和通向克劳森多夫那条路两旁的杨树一样，粗壮笔直，树干闪亮，树皮上布满了小孔，让人看了就想一把抱住。

我开始在日历上画十字，一天天地数着日子，每一个十字都会缩短一次等待。为了填满这些寂寞，我强迫自己养成了一系列的习惯。

每天下午上巴士之前，我都会和赫塔一起去井边打水。每天回家之后我都会去喂鸡。我把饲料留在鸡舍里，它们就都会神经质地扑扇着翅膀啄食。总是有一只鸡无法挤入那个吃饭的小集体里面，它左右摇晃着脑袋，不知道要干些什么，也许它被它的伙伴们惊呆了。这只可爱瘦弱的小东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只小母鸡总是努力往最里面跑，好半天才能给自己找到一个位置。它必须得闯进两个同伴之间，然后努力把其中一只挤出去。但是很快地，小鸡间的平衡会又一次被打破。其实食物够分，但是母鸡们从来不相信。

我看过它在巢穴当中下鸡蛋的样子，它几乎要被自己震动的嘴巴催眠了，它高昂的颈部从一侧倾向另外一侧，这是发生撕裂的先兆。突然间它的喉咙里发出呻吟，它圆形的祖母绿的眼睛好像突然就要裂开了。我很想知道它是否因为痛苦而呻吟。难道它也被上帝定下了生孩子必须受罪的惩罚吗？又是以什么罪名呢？还是相反，它是为它的生产而欢呼？母鸡每天都在见证自己创造生命的奇迹，而我连一次都没有。

有一次，我很惊讶地看到那只最年轻的母鸡用嘴去啄它刚刚下的鸡蛋，我威胁着要踢它，但是我的动作不够快，它已经把蛋吃掉了。

“它吃了自己的孩子。”我一脸震惊地向赫塔报告。

她向我解释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有时候母鸡会不小心弄破一个鸡蛋，出于本能它会吃它。因为鸡蛋很美味，所以它会全部吃完。

在食堂，扎比内告诉自己的姐妹格特鲁德和西奥多拉，她的儿子从广播里听到希特勒的声音会害怕。孩子下巴发颤，脸都皱了，还会突然哭起来。“这是我们的元首啊，”他妈妈问，“你为什么要哭呢？”“孩子们可都是特别喜欢元首的。”西奥多拉评论道。

德国人都喜爱孩子。母鸡会吃它们的孩子。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德国人。母鸡会让我感到害怕，而有的人也会让我感到害怕。

一个星期天，我和约瑟夫一起到树林里面去收集木材。我们在树林间欢快地吹着口哨，用独轮车运输原木和树枝，把它们堆放在曾经的动物饲料架上。格雷戈尔的祖父母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耕作，他们饲养奶牛和耕牛，就像他的曾祖父母做的那样。后来约瑟夫把一切都卖了，供格雷戈尔去学习，自己则在米尔登哈根城堡里找了一份园丁的工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的儿子问他。“哎，反正我们也老了，”他回答道，“只需要一点钱就可以过日子。”格雷戈尔没有兄弟姐妹，他的母亲曾经生下过另外两个孩子，但是他们都夭折了，他甚至都没有见过他们。他是意外出生的，本来他的父母都认了命，准备孤独终老了。

当格雷戈尔告诉他们他希望去柏林读书的时候，他的爸爸很失望，这个意外得来的孩子不仅一下子长大了，现在甚至决定抛弃他们了。

“我们吵了一架，”约瑟夫向我坦白，“我不明白，我很生气。我向他赌咒说我永远不会放他离开。我不会允许的。”

“那后来呢？”格雷戈尔从没告诉过我他这段历史，“他没有离家出走吗？”

“他不会这么做的。”约瑟夫停下了手推车。他皱了皱脸，揉揉自己的背。

“您不太舒服吗？您松开手吧，我来推车。”

“我是老了，”他反驳道，“但也没那么老。”说着他又朝前走，“有

一个教授来找我们，他和我还有赫塔坐在桌子旁。他告诉我们，格雷戈尔非常优秀，不去柏林学习可惜了。怎么说呢，看到一个陌生人比我更了解我的儿子，让我像被雷劈了一样。我心里有怨气，所以我对那个教授也不怎么礼貌。但是后来在马厩里面，赫塔和我讲了讲道理。我突然觉得自己简直是个白痴。”

在老师到访之后，约瑟夫决定，除了母鸡之外，卖掉所有动物，于是格雷戈尔去了柏林。

“格雷戈尔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一直很努力，他终于有了一份出色的职业。”

我仿佛看见格雷戈尔在书房里的样子。他摇摇晃晃地坐在椅子上摆弄着制图仪：他用尺子不停地在纸上移动，时不时用铅笔挠挠自己的后背。我很喜欢在他工作的时候偷窥他。我喜欢看他忘记周围的环境，也忘记我的存在的样子。我真想知道，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是这样。

“真希望他没有去参加战争……”约瑟夫又一次停下了脚步，但这次不是为了揉背。他目光向前没有说话，好像他需要再次审视一下整件事情。他为他的儿子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但是这么做还不够。

我们在安静中整理好了干草房里的木材。这不是一种悲伤的安静，我们经常谈论格雷戈尔，因为他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全部。但每次谈完他后我们就必须保持一段时间的沉默。

我们刚进屋，赫塔就告诉我们牛奶已经都喝完了。我告诉她，第二天下午我会自己去拿牛奶，我现在已经认路了。

我还没有看到那些手拿着空瓶子排队的女人，粪便的味道就已经向我证实我已到了取牛奶的地方。我带了一个装满蔬菜的篮子，用来换牛奶。

奶牛的哞声在乡间响起，那是求助声，和空袭警报一样绝望，我是唯一一个因此激动的人。其他的妇女排着队慢慢向前，有的聊着天，有的默默抓着孩子的手，如果他们走远了，就把他们喊回来。

这时，我看见两个女孩从队伍里走了出来，看起来很眼熟。等她们

走近，我才意识到她们是两个试毒员。其中一个皮肤干燥、发型像男孩子的叫贝雅特。另外一个女人宽阔的乳房和臀部被挤压在一件棕色夹克和一条乡下妇女的裙子里，她的五官非常立体，像浮雕一样，她叫海克。我一时冲动，冲她们挥了挥手，但是我立刻停下了，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工作算不算秘密，是不是需要我们装作不认识。我不是这个小镇的人，除了在这个马厩，我也从来没见过她们，在食堂以外的地方，我们还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也许对她们打招呼有些太过了。也许她们并不会回应我。

当她们从我身边经过时，没有人做任何表示。贝雅特眼睛发红，海克说：“我们分一分牛奶吧。下一次你再把你的还给我一些就好。”

偷听她们谈话让我多少有一些尴尬。贝雅特买不起牛奶。他们还没有把第一份工资给我们，不过党卫军说过我们的工作是有报酬的，虽然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有多少钱。有一瞬间，虽然我就在近处看她们，我还是有些怀疑我是不是看走眼了。她们怎么会不认识我呢？我的目光继续跟着她们，希望她们能转身，但是她们并没有。她们渐渐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很快队伍就排到了我。

回家的路上，天空中飘起了雨，雨水将我的头发打湿黏在了太阳穴上，我的大衣湿透了，我在寒冷中不住颤抖。赫塔提醒过我带件披风出门，但是我忘了。我穿着从城里带来的鞋子，一不小心就可能在泥水里摔倒。猛烈落下的水滴让我视线模糊，我害怕迷路，尽管穿着高跟鞋，我还是飞速地跑了起来。当跑到一个离教堂不远的地方时，我突然看见了两个女人手臂的轮廓。我通过海克的裙子认出了她，或许是从我每天在食堂里排队时盯着的那个后背认出了她。如果她们两个都带了披风，那我们三个应该可以挤一挤的。我喊了她们。但是一阵雷声盖过了我的声音，于是我又一次喊了她们的名字。她们还是没有转过身来，也许是我搞错了，那并不是她们。我慢慢地停下来，静静地站在瓢泼大雨里。

第二天在食堂里，我不住地打着喷嚏。

“祝你早日康复。”我右边有人说道。

我惊奇地发现这是海克的声音，她越过坐在我们中间的乌拉问我：

“昨天你也着凉了，是吗？”

那她是见过我了。

“是啊，”我回答说，“我感冒了。”

难道她们没有听到我昨天喊她们吗？

“喝点热牛奶兑蜂蜜吧，”像是得到了海克的允许，贝雅特对我说道，“反正他们每天要浪费这么多牛奶，这可是一种万能药呢。”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们对食物的怀疑已经渐渐变淡，就好像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有信心的求婚者一样。我们这些婢女现在吃东西越来越贪婪了，但是不一会儿，我腹中的肿胀感就拖慢了我的热情，食物在我肚子上的重量就像压在我心脏上的重量。每吃一顿盛宴，我都怀有一种连续不断又模糊的绝望。

我们仍然担心会中毒。也许是在一天正午，当乌云遮住太阳的时候；也许是在一个黄昏，当一切都将渐渐消失在黑暗中的时候。尽管如此，没有人可以掩饰饺子汤带给我们的喜悦，那些由粗面粉粒做成的小饺子在我们的嘴里慢慢融化；也没有人可以否认对大锅炖菜的喜爱，即使我们吃不到牛肉和猪肉，也吃不到鸡肉，因为希特勒拒绝吃肉。他在广播中提倡市民每周至少吃一次炖蔬菜，他以为，在战争期间，城市里是很容易找到蔬菜的。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德国人是不是会饿死的，如果他饿死了，他就是一个糟糕的德国人。

我想念格雷戈尔，我抚摸着我的肚子，它已经满满的，装不下东西了。我与毒药的斗争事关重大，只有我的胃有了饱腹感，我的双腿才会停止颤抖，它们的防御性才会下降。我要支撑到圣诞节，至少要到圣诞节。我暗自对自己说，用食指在我食道的尽头处悄悄地画了一个十字。至少我得这么相信。我幻想着我身体里面是一堆灰色的碎片，就像我在克鲁梅尔给我们的书上看到的那样。

我渐渐觉得眼泪会让我们显得很可怜，对莱妮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她感到恐惧，我会握着她的手，抚摸她因酒糟鼻而变得不那么好看的脸颊；艾尔弗里德从来都不哭，在等待的时间里，我经常听到她粗重的呼吸声，而当她因为什么事情而分心的时候，她的眼睛总是会忘记那原有的冷酷，因此变得美丽。贝雅特吃东西的时候总是拿出洗床单式的激情，用力地咀嚼。海克坐在她的对面，莱妮告诉我她们从孩提时代起就是邻居了。莱妮切黄油欧芹烧鳟鱼时支起的手肘撞到了乌拉的手臂，然

而乌拉丝毫没有察觉，她还在舔着自己的嘴角。正是她这个下意识的孩子气的习惯动作让党卫军喜出望外。我观察着其他人的饭菜，以及当天和我吃同样食物的女人，这总是让我觉得我跟她之间有很深的关系。我会对她脸上突然冒出的痘痘表示一种温和的关心，不知道她是因为早晨洗脸太用力还是太懒了。我还会关心她腿上穿着的起了毛球的旧袜子，可能是她前一天晚上睡觉前就已经穿在脚上了。她的存活对我来说就像我活下来了一样，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命运。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就连党卫军也慢慢变得轻松了。如果他们心情好，午饭期间他们聊天时就不太注意我们，也不会警告我们闭嘴。但要是他们有时候兽性大发，就会把女人们拉到他们身边，好好地打量一番。他们看我们的神情和我们看食物的眼神一样，仿佛他们准备把我们吃了。有时候，党卫军在我们中间穿梭，用包裹在皮套中的武器轻点我们的背，让我们惊得跳起来。有的时候，他们只会重点对待我们中的某一个，从背后突然袭击：通常是乌拉，她是他们的宝贝，他们会伸出一根手指，抚到她的胸上，喃喃道：“你变脏了。”乌拉就会突然停止吃饭，而我们所有人也都会停下来。

然而他们最喜欢的还是莱妮，因为她有一双闪闪发亮的绿眼睛、透明的皮肤，她是那么弱小，那么无助，不会掩饰自己的忧郁。有的看守会上前捏她的脸，把她的脸弄得皱皱的，然后说：“瞧你这对大眼睛。”莱妮只能尽量不尴尬地笑着，因为她相信她的温柔会让别人来保护她。她注定要为她的脆弱付出代价，党卫军早就察觉到了这一点。

在克劳森多夫的营房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随时丧命——活着也没有比死去好到哪里。在这件事情上我母亲说得对。我边想边嚼着嘎吱作响的菊苣，菜花那令人放心的家的味道浸满了整个墙壁。

第八章

一天早晨，克鲁梅尔向我们宣布，他会好好呵护我们。他就直接这么说了——呵护。我们这些人可再也不相信什么“呵护”了。他说，过会儿要给我们尝一下他做的脆面包片。他刚才为了给他的上司一个惊喜，特意去烤了一些。他说道：“元首可喜欢吃脆面包片了，打仗的时候他还在战壕里做过呢。”

“那当然啦，反正在前线什么食材都有。”奥古斯丁又发出了啧啧声，“黄油啊，蜂蜜啊，酵母啊，他直接在那儿就可以生产了。嗯，还汗流浹背的呢。”还好看守们都没有听见她说什么，克鲁梅尔也已经和助手们一起回后厨了。

艾尔弗里德的鼻子里却传出了一种声音，那是笑声。我可从来没有听过艾尔弗里德笑，这种意外惊喜让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我倒是想控制自己，可艾尔弗里德的声音一传到我耳朵里，我就忍不住爆发出了笑声。“喂，你这个柏林人能不能控制一下自己啊？”她冲我不满道。但是，我听见整个食堂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憋笑声和抽气声，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大家都爆发了，在党卫军怀疑的目光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

“你们笑什么笑？”他们的手指在枪套上面画着，“到底怎么了？”有一个看守直接用手砸了桌子一拳。“还要我让你们停下来吗？”

我们艰难地止住了笑声。“守点规矩！”高个子喊道，我们的欢乐逐渐稀释。

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体欢笑。

烤面包片又脆又香，我细细品尝着这份工作的特权带来的美味。克鲁梅尔十分满意，随着认识他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发现他对自己厨师的

职业由衷地自豪。

他也是柏林人，最初在米托帕公司工作，那是一家参与卧铺车厢和餐饮车厢管理的欧洲公司。1937年他被元首雇用，负责他专列中的饮食。专列设有轻型防空炮，能够对低空攻击做出迅速的反应，而且拥有典雅的套房。克鲁梅尔说，希特勒曾开玩笑地把他的专列称作“狂热的帝国总理酒店”。美国还没有参战的时候，这辆专列的代号就叫作“美国”。后来它就被降级成了“勃兰登堡”，这个名字在我听来就没有那么豪迈了，但我不会告诉克鲁梅尔。现在，元首在狼穴长居，克鲁梅尔每天要煮两百多份，同时也“呵护”着我们这些试毒员。

我们从来不被允许进入厨房，他也只在有事情要告诉我们的时候才会走出来，或者在警卫向他报告情况的时候。比如，海克指出当天水的味道有点奇怪，接着贝雅特也同样提出这个问题，女人们会接二连三地跳起来，头疼啦，恶心啦，反胃啦，痛苦啦之类的。这可是圣涛乐矿泉水⁽¹⁴⁾啊，元首的最爱！他可是把它叫作“幸福之水”的，怎么会喝了不适呢？

一个星期二，两个帮厨因为发烧没有来，克鲁梅尔来到食堂请我帮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找我，也许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研究了所有那些很快就被其他人厌倦的营养书，又或许是因为我和他一样都来自柏林。

看到他的选择，“洗脑党”的那些姑娘都气歪了鼻子，要说谁最有资格进厨房，应该是她们吧，她们是完美的家庭主妇啊。有一次，我听见格特鲁德跟她的姐妹说：“你看到那篇报道了吗？那个年轻的女人进了一家犹太人的商店，然后马上就被囚禁起来了。”“没有，在哪儿发生的？”扎比内问她。格特鲁德自顾自地继续说：“那女人发现商店后面有一条地下通道，她从那里经过时，店主联合了其他犹太人，把她带到犹太教堂里轮奸了。”扎比内惊恐地闭上了眼睛，就好像她正目睹整个过程一样。“是真的吗，格蒂⁽¹⁵⁾？”“当然啦，”她的姐妹重申道，“在把女人献祭之前，犹太人总会先强奸她。”“你是在《先锋报》⁽¹⁶⁾里读到这则消息的吗？”西奥多拉问她。“你只要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就行了。”格特鲁德回答。“现在我们这些家庭妇女就算是去商店买个东西也不安全了。”“这倒是真的，”西奥多拉说，“幸好那些商店已经关门了。”

一个理想的德国母亲、德国妻子和德国家庭主妇，是会用一切去捍

卫自己的。正因为西奥多拉是有资格的代表，所以她被批准与克鲁梅尔谈话。她告诉厨师，战前她的家庭就经营着一家餐厅，她在厨房方面是有经验的，她可以证明。厨师同意了。

他给了我们一人一条围裙和一大盒蔬菜。我在大水槽里面冲洗蔬菜，西奥多拉则负责把它们切成方形或者圆形。除了有时候菜上还沾了泥土，或者我不小心在地板上弄出了泥点，她会因此责备我之外，她一整天都不会和我说上一句话。作为一名打杂的临时工，她花了大量的时间窥视其他助手，站在他们后面，阻碍他们的行动。“你快让开！”克鲁梅尔在几乎要被她绊倒时命令道。西奥多拉向他道了歉，但是又解释道：“工作是靠机灵抢过来的。我几乎不能相信可以和您这样重要的厨师在一起并肩工作呢。”“并肩工作？我告诉过你，快让开！”

不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由于她相信她已经是这个团队里面表现良好的成员了，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她也开始认真思考起我的存在。我也是这个团队的帮手，但是由于我在厨房的无能，我显然只算是她的手下罢了。于是她向我讲起她父母的小餐馆，那是一家小馆子，不到十张桌子：“但是那里很迷人，你应该去看一看的。”战争迫使他们关闭了餐馆。她一直计划着等战争结束就重新开业，并且扩大餐馆的规模。她两边眼角的皱纹看起来像两条小鱼的鳍外部线条。开餐厅的梦让她充满活力，她眉飞色舞地讲着，鱼鳍也在她的脸上闪烁。我觉得我几乎可以预见它们跳起来，抛物线般落入装满沸水的锅子。

“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的人来了，就没有办法了。”她说，“我们什么餐馆也开不成，那就是世界末日了。”鱼儿停了下来，游不动了，她的眼睛突然就像千年的化石一样，数不清有多少岁。她多大岁数了？

“我希望那不是世界末日。”我冒着险说，“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赢得这场战争。”

“还是不要去想了，如果俄国人赢了，我们要么死，要么被奴役，男人们都会被赶到西伯利亚的苔原，你听说过吗？”

“不，我没有听说过。”

我还记得格雷戈尔在我们奥特美斯维格家的客厅里，从我们在旧货店买的扶手椅上站起来场景。他走向窗口，叹了一口气说：“俄国人的时间。”他向我解释，这是德军的一种形容词，意指即使在最严峻的

气候条件之下，俄国人还在攻击，“他们什么苦都能吃。”

有时候他会跟我讲前线的故事，比如说“早安音乐会”，红军用爆炸袭击了音乐会，起这个名字，旨在让德国人从梦里醒过来。

有一天晚上，我们裹在被子里，他跟我说：“如果俄国人来了，他们不会对我们有任何怜悯。”

“你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德国人对苏联的战俘和对其他人不一样。英国和法国的战俘都可以接受红十字会的帮助，甚至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去踢球。但是苏联人的战俘要在他们自己人的监视下挖战壕。”

“在他们自己人的监视之下？”

“对，那些被许诺有一片面包吃或者被多余的肉汤所诱惑的苏联人，”他一边关灯一边说道，“如果他们也对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情，那会很可怕的。”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很久，无法入睡。格雷戈尔抱住了我：“对不起，我不应该告诉你这些事情的。你不该听到这些事情的。这种事情谁又需要知道呢？”

后来他渐渐沉入梦乡，我仍然醒着。

“俄国人对我们做什么都是我们应得的。”我说道。

西奥多拉一脸鄙视地看着我，继而无视我。她的鄙夷让我心情更加低落了。为了她忧郁并不值，她不是那个我想要与之分享内心的人。实际上，我和别人也没什么好分享的。即使是同奥古斯丁，即使她逗我“你冒犯了你的新朋友吗？”。我也不会和莱妮分享，她总是毫不吝啬地在我面前赞美食物，就好像是我弄出了这一桌佳肴。我和这些女人没有一点可以分享的东西。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和她们在一起。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希特勒的试毒员。

尽管这样，“洗脑党”对我的敌意还是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在厨房里比平常更笨拙了。有一天，我心不在焉地烧到了手腕，立刻尖叫起来。

在我烧伤皮肤的可怖情景之下，西奥多拉突然放弃了对我的不闻不问，她一把抓过我的手臂，打开了水龙头。“先用冷水冲一下。”在其他厨师还埋头于他们的活计的时候，她削了一块土豆，用抹布擦干我的手，在伤口上敷了一片土豆。“疼痛会慢慢减轻的，你能感觉到。”她如母亲一般的照顾使我软化了。

我一只手按着手腕上的土豆片，站在厨房的一角。我看见克鲁梅尔朝汤里扔了一种食材后一个人窃笑。他注意到了我惊奇的眼光，用食指在嘴边比了比：“完全不吃肉是不健康的。你也学到这个知识了，对吧？还是我给你的书里写的呢，不是吗？大老板完全不听我和他讲道理，所以我就偷偷地把猪油放进汤里。你不知道他发现后会多么生气吧？但他基本上不可能发现得了。”他开始捧腹大笑，“只要他觉得自己变胖了，我就没法劝他吃下任何东西。”

西奥多拉本来正在往碗里倒面粉，听到这话，她向我们走近了一些。

“相信我，他一口都不吃。”厨师一边瞥了一眼西奥多拉，一边跟我说，“奶渣拌意大利面？多好消化啊……虽然他一点都不想吃。巴伐利亚苹果蛋糕，他的最爱：你们想一想，上一次的会议结束之后，每天晚茶我都会给他上这道点心，但是我发誓，如果他要节食的话，他一块都不会吃的，两周之内他就能瘦七千克。”

“什么是晚茶？”“洗脑党”问。

“就是晚上和朋友的小聚会。元首会喝点茶或者热巧克力，他可少不了巧克力啊。至于其他人，灌杜松子酒的可能性比较大。他也不喜欢他们喝酒，只能说他是在忍受他们吧。只有一次对霍夫曼——那个摄影师，他特别不高兴，喊人家‘大醉汉’。但总的来说，头儿不在乎。他一向爱闭着眼睛听《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¹⁷⁾，他总是说：‘如果我立刻死掉，我希望它成为我耳朵里最后听到的声音。’”

西奥多拉已经听得入了迷，我从手腕上取下土豆片，红肿已经蔓延开来。我希望她能大叫一声赶到我的面前，把土豆片重新放回它该在的位置，并让我紧紧地按住那里，不要自作主张。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妈妈。

但是“洗脑党”显然已经被克鲁梅尔的故事深深吸引，她再也不关注我了。从厨师谈论希特勒的方式来看，很明显他十分关心希特勒，理所当然，他对我们、对我也是很关心的。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已经是随时为元首去死的人了。每一天我们的盘子——我们十个人的盘子——都整整齐齐地摆在一起，也变相表明了元首还活着。永生的承诺是不存在的：每个月的两百马克就是对我们的补偿。

钱是在几天前的晚上装在信封里，在出口处给我们的，我们都把信封塞进了口袋或钱包里，不敢在巴士上打开它。我在房间里关上门数了一下钱，才惊讶地发现这个数字比我在柏林的工资还要高。

我把土豆片扔进了垃圾桶里。

“头儿说，如果吃肉或者喝酒的话，他就会出汗。我告诉过他，他出汗是因为他实在是太辛苦、太激动了，”克鲁梅尔一谈起元首就没完，“看看那些马儿，’他这么跟我说，‘看看那些牛，它们是食草动物，强壮，耐力也够。再看看狗，只要跑一小会儿，它们的舌头就耷拉下来了。’”

“这倒是真的，”西奥多拉赞同道，“我从没这么想过呢。他说得可真有道理。”

“好吧，他是不是有道理我不知道。他还说过他受不了屠宰场杀牲畜的场景，太残酷了。”现在，克鲁梅尔只对着西奥多拉一个人说话了。

我从一个大篮子里拿出了一块面包，把面包皮从上面掰下来。

“有一次在晚餐的时候，头儿告诉他的客人，他曾经在一家屠宰场里面待过。他还记得胶鞋踩在新鲜血液上那种搅动的感觉。你想想，可怜的迪特里希⁽¹⁸⁾听完不得不放弃吃那盘肉……他是一个很容易受影响的人。”

“洗脑党”笑得十分开心，而我揉捏着面包，直到把它们捏出了各式各样的形状：有圆圈样的，有麻花样的，还有花瓣样的。克鲁梅尔责备我浪费粮食。

“我可是为了您才做的呢，”我说，“它们就像您一样呀，面包屑大

人。”

他搅动菜汤，不再理我，并让西奥多拉去检查烤箱里的萝卜有没有熟。

“这里的所有事情都在浪费，”我接着说道，“我们这些女人在这儿就是浪费。这么严密的检查机制下谁能毒死他？太荒谬了。”

“你什么时候成了检查机制方面的专家？”“洗脑党”问道，“还是说你是军事战略家呀？”

“你们都别说了。”克鲁梅尔警告我们。他就像夹在两个吵架的女儿中间的父亲一样无奈。

“我们之前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难道他以前就不怕会被毒死吗？”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看守进来了，他让我们回到餐桌那儿。面包渣被留在大理石架子上，渐渐变干。

第二天，当我被厨房伙计们无可挑剔的工作配合以及“洗脑党”的勤奋专注包围时，克鲁梅尔给了我们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他悄悄地给了我和西奥多拉一些水果和奶酪。他亲手把这些东西放进了我以前在柏林时拎着去上班的皮包里。“为什么？”我问他。“这是你应得的。”他对我说。

我全都带回了家。当赫塔发现克鲁梅尔给我的东西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多亏了我，晚上她才吃到了好东西。多亏了希特勒。

第九章

奥古斯丁飞速地穿过巴士的过道，她深色裙子的下摆好像泡沫一样飞舞起来。她把手放在莱妮的背后触摸着她的头发，然后说：“我们换个位置吧，就今天。”

外面天已经黑了，莱妮困惑地看了看我，站了起来，坐到一个空位上。于是奥古斯丁占据了我边上的那个位置。

“你的包里装了东西。”她说。

所有人都扭头看着我们，不仅仅是莱妮，贝雅特和艾尔弗里德也转过头来。只有“洗脑党”们没有，她们坐在最前面，就在司机的后面。

我们自发地分成了好几个小组。也不是说每个小组里面的人真的多么互相喜爱，就像地球的板块移动不可避免一样，我们只是单纯地和一些人更加亲密，对有些人敬而远之。对我来说，莱妮每次眨眼睛需要保护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肩负着保护她的责任。还有艾尔弗里德这个把我推进厕所的女孩。从她的举动中，我推断出她和我有同样的恐惧，那是她接触人的一种方式。亲密，对的。也许高个子没有说错，艾尔弗里德曾经试图挑起战争，但就像男孩子们一样，只有通过打一架才能清楚到底应该相信谁。我们的剑拔弩张最后被看守的介入打破了，所以我们的战斗悬而未决，她和我之间产生的这种磁场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吸引彼此。

“它里面有东西吗？回答我。”

西奥多拉回过头来，这是她对奥古斯丁嘶哑声音的本能反应。

几个星期前，她曾经说，元首有时不够理性，他都是在凭本能干事

情。“对对，他用的是大脑。”格特鲁德一边用牙齿交叉咬着两个发钗，一边附和着，根本没有意识到她跟自己朋友说的话矛盾了，“你知道他们瞒了他多少东西吗？”格特鲁德终于把发钗紧紧插进一侧编起的辫子之后继续说，“他并不知道身边所有发生的事，所以这并不总是他的错。”而奥古斯丁听完她的这番言论，做了一个朝她吐口水的动作。

现在她跷着二郎腿坐在我边上，一只膝盖顶着前排的座位：“从几天前开始，厨师就给你额外的报酬让你带回家。”

“是的。”

“那好，我们也要。”

“我们”？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试毒员中从来没有团结一致的说法，我们是漂浮和碰撞的板块，一会儿漂得近些，一会儿又漂远了。

“你也不想自私吧。既然他对你这么好，你让他多给你一些呗。”

“你从这里面拿吧。”我把包递给她。

“这对我们来说可不够，我们想要牛奶，至少几瓶吧，我们的孩子需要喝牛奶。”

但她们的工资也比普通工人的高啊。这根本不是她们孩子需不需要的的问题，这是她们在给自己讨公道呢。奥古斯丁会这么辩解的。如果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一定会反问：“既然你能拿，凭什么我们就不能拿呢？”“那你去问西奥多拉拿呀。”我真想挑衅。可她也一定知道西奥多拉会毫不客气地拒绝她的。出于什么原因，她觉得我会接受她的条件呢？我不是她的朋友，但是她察觉到了我对获得认同的焦虑，她从一开始就察觉到了。

如何能成为朋友呢？现在我明白了她们的意思。我甚至可以说，我这些伙伴的面孔似乎已经与我第一天看到的不一样了。

在学校里或者在工作中，在每一个你必须待很长时间的的地方，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你被胁迫成为某些人的朋友。

“好，奥古斯丁。我明天试着问问他。”

第二天早晨克鲁梅尔告诉我们，生病的帮厨们都回来了，他不需要我们两个人帮忙了。我向奥古斯丁和其他几个被选出来做代表的人解释了这件事情，但是海克和贝雅特并不甘心。“这不公平，你享受了额外的东西，我们却没有。我们还有孩子呢，你有什么？”

我没有孩子。每次我跟我丈夫提起，他都告诉我，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他要去参加战争，我没办法一个人抚养孩子。他在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40年的时候就离开了家。我一个人生活在没有格雷戈尔的公寓里面，家具是从旧货店买来的。我们喜欢周六的时候去旧货店。有的时候只是为了去趟附近的面包房吃早饭。那里有肉桂蜗牛小包⁽¹⁹⁾和加了罂粟种子的苹果馅饼。我们直接拿着袋子吃早餐，一边走路，一边每人吃一口。谁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没有他也没有孩子地生活在一个满是旧物的公寓里。

书籍免费分享微信 jnztxy 朋友圈每日更新

德国人都喜欢孩子，元首在游行的时候也会抚摸孩子们的脸颊，并敦促女人们生更多的孩子。格雷戈尔虽然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德国人，但是他并没有让自己被这种思想影响，他说把一个人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意味着要判这个人死刑。但战争会结束的，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不是战争的问题，”他回答我说，“这就是人生啊，无论如何，所有人都会死的。”“你的状态不对，”我指责他，“你自从参了军就变得很沮丧。”他为此生了我的气。

或许这个圣诞节在赫塔和约瑟夫的帮助之下，我可以说服他。

如果我怀孕了，我肚子里的孩子可以吸收食堂饭菜里的营养。孕妇并不是一个好的实验品，甚至可能会破坏这个实验。但是党卫军不会知道的，至少，只要我不去检查或者不显怀，我就能一直在食堂里吃饭。

我知道这样做会有毒死孩子的危险，我们两个当然可能一起死掉，但我们也可能都活下来。他粉状的骨头和柔软的肌肉都会由希特勒的食物供养。他会是帝国的孩子，甚至在称他是我的孩子之前，他先是帝国的孩子。更何况，人生下来就是背负了原罪的。

“你去偷点吧。”奥古斯丁说，“走进厨房和厨师聊天，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你可以跟他讲讲柏林的事情啊，说说你上班的事，或者随便编点什么东西，只要他把头转到别的方向，你就把牛奶拿过来。”

“你疯了吗？我不能这么做。”

“那又不是他的东西，你又不是偷他的东西。”

“但这不公平，我不该让他受损失。”

“为什么，罗莎，难道我们就活该？”

光线使得帮厨们擦拭过的大理石架闪闪发亮。

“苏联迟早要屈服的，你就等着吧。”克鲁梅尔说道。

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他已经把帮厨们都派出去卸载刚运到狼穴火车站的粮草了。他告诉助手们他一会儿就去，因为我让他给我解释一个他让我们读的书里的问题，我实在是找不到其他更好的理由拖住他了。等他解释完，当老师的体验会让他很满意，这样我就可以问他要两瓶牛奶，虽然克鲁梅尔从来没有给过我牛奶，虽然我这样做会显得既粗鲁又没有教养。以前我是得到奖励，现在我是直接开口要东西。可是，我该怎么解释这些牛奶要给谁呢？我没有孩子啊，我从来不需要给人喂奶啊。

克鲁梅尔坐着和我聊天。几分钟后他站了起来，像往常一样用他滔滔不绝的话语淹没了我。他提到那年2月，斯大林格勒的挫败让所有人都士气低落。

“他们牺牲是为了让德国能够继续活下去。”

“元首是这么说的。”

“而我相信他，难道你不相信吗？”

除非我不想要我的特别待遇了，否则我不能激怒他。我只能不确定地点了点头。

“我们会赢的，这是真理。”

他跟我讲，希特勒晚上会对着一面挂着苏联国旗的墙壁就餐，那面国旗是他在巴巴罗莎计划⁽²⁰⁾开始时缴获的。在那个房间里他向客人们展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而其他的欧洲国家都低估了它。难道他

们没有意识到苏联人有多么阴暗诡谲、神秘莫测、令人不安，就像瓦格纳作品里面的那艘幽灵之船⁽²¹⁾一样吗？只有像他这样坚定不移的人才能成功地击沉这艘船，即使要追到世界末日⁽²²⁾，他也在所不惜。

“只有他可以。”克鲁梅尔看了眼手表，说道：“哎，我得走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问您要一些牛奶，为了几个不是我自己的孩子。“不，不用了。谢谢。不过我能做什么帮您、报答您吗？您对我实在太好了。”

“你真贴心。有一个忙你可以帮我，这里有好几千克的豆子需要去皮，你可以先做起来吗？我负责告诉那些看守在我们回来前你会一直留在厨房里。”

他让我一个人待在他的厨房里，我是有可能在食物里下毒的，但是克鲁梅尔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性。我是希特勒的试毒员啊，我和他是一个团队的，我和他一样是柏林人，他十分地信任我。

排队上巴士时，我把包紧紧地贴在肚子上，我相信我听见了玻璃瓶的晃动声，我试着用手去捂住它们。我走得很慢，但也不能太明显，否则会被党卫军发现。艾尔弗里德就在我的后面，她总是习惯排在我的后面，我们永远都是走在最后的两个人。我们不是懒散，只是还没有办法适应。尽管我们已经愿意遵守规矩，但是适应的过程仍困难重重，就像不兼容的材料或者尺寸不匹配的两片东西一样。但是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堡垒，找到方法去适应环境。

她的呼气声萦绕在我的脑后：“喂，柏林人，你是卡住了吗？”

“不许说话。”一个看守心不在焉地说。

我隔着包紧紧抓住瓶子继续慢慢走，注意不让它们发出一点声响。

“我还以为你明白了什么叫‘不要多管闲事’。”艾尔弗里德的呼气声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

我看见那个高个子已经不急不缓地朝我走过来了。他一靠近我就对我仔细打量。我仍然走在其他女人后面，他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我的手松开了皮包。我以为玻璃瓶碰撞的声音会响起，但是我放对了位置，

它们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地待在我的包里。我做到了。

“又看见你们聊天了。”

艾尔弗里德停了下来。

高个子守卫也拦下了艾尔弗里德：“我上次警告过你们吧，要是再被我抓到，我可要从你们这儿捞点好处了。”

冰冷的玻璃瓶直贴着我的胯骨，他只要不经意打开我的包就会发现我的秘密。但是他放开了我的胳膊，用食指和拇指合上我的下巴，俯身朝我看来，我吓得下巴直打战，不断用目光找着艾尔弗里德。

“你今天闻起来像颗西兰花啊，真遗憾，看来我得下次再找你讨好处了。”高个子哈哈大笑起来，他笑了很久，根本没考虑到他的同僚们都站在他的后面。等他们一同调笑的兴致淡去，高个子才说道：“瞧把你吓的，我就是开个玩笑。我们在里面时对你们不也挺好的吗？你还要怎么样啊？”

交易是在巴士上偷偷进行的。奥古斯丁带来了一个小帆布包。我的下巴仍然在不住地颤抖，我的脸颊里面有一条神经在不停地拉扯。

“你做得很好，很慷慨。”她对我露出感激的笑容，看上去很真诚。

如何能成为朋友呢？

我们和他们。这是奥古斯丁放在我面前的解释。我们是受害者，是年轻而别无选择的女人；他们是敌人，是滥用职权的居上位者。奥古斯丁的意思是，克鲁梅尔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他是一个纳粹党。而我们从来都不是纳粹分子。

唯一没有给我笑脸的人就是艾尔弗里德，她把视线投向窗外正连续展开的一望无垠的田野，还有干草房。我每天都会乘坐巴士，途经八公里回到格罗斯-帕特斯奇，那里，是我的避风港。